

缺乏「性」與「暴力」： 非美國式人格

◎ 孫隆基

國民性研究的角度之一，是透過「男性化」與「女性化」二元對立看問題。這類論述很重要的一環是心理動力學的(psychodynamic)人格論，而弗洛伊德主義乃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用這個角度研究中國國民性，在戰後的美國開花結果，在中國則少為人知，因為這種研究角度完全着眼於「個人成長」，與「救國」無關。中國人歷來探討國民性都是為了「救國」，美國人用研究「中國人」借題發揮者，卻是如何「救個人」。他們研究中國人性格，歸根結柢是在談自己，但仍提供了一個對中國人本身陌生的角度。

弗洛伊德學說基本上以性的成長定義個人成長。美國文化對性別的規範，特別強調兩性的性徵都該全面盛開，充分明朗化，特別是指心理和人格方面。因此，當美國人應用弗洛伊德學說看問題，就透露出恐懼男性性心理不成長的嚴重焦慮，其程度遠甚於歐洲的弗洛伊德思想。用美國人格理想——一個成人，尤其是男性，必須有處理「性愛」與「攻擊性」的心理能力——作為標尺衡量中國式人格，

後者顯得心理發育不全，被截短了一大段。

在探討美國人的中國人論之先，必須對美國文化裏性別兩極化現象作簡短說明。

美國人性別的兩極分化

任何人類社會都有「男女有別」的規範。傳統上，它方便父權社會支配整個女性性別。今日男女趨於平等，並不等於性別本身的差別趨於泯滅。反而，在今日女權運動最發達的美國，兩性的心理距離愈拉愈遠，到了互不理會、反目成仇的地步。女權運動和男權運動的極端份子甚至主張分道揚鑣，有如60年代某些黑權與白權分離份子，索性走上各自成立「國家」的地步。

這場戰爭，在理論上先發動攻勢的是男性。遠的不說，至上世紀末，在西方，這個攻勢開始披上「科學」的外衣：達爾文進化論。男女性別分化被認為是生物在較高進化階段才出現

的，因此，男人的「女性化」或女人的「男性化」，都是返祖現象(atavism)，亦即是退化(degeneration)^①。世紀末仇視女性的理論家首推奧國的奧圖·懷寧格(Otto Weininger)。到了本世紀，對女性的仇視導引出法國的昂利·蒙特朗(Henri de Montherlant)和美國的非力普·懷理(Philip Wylie)的仇母論。懷理創「媽道主義」(Momism)一詞，為文痛辟之。二十世紀的論述，已逐漸從生理學轉化為心理學，例如40年代初的懷理就稱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在十九世紀初，美國母親教養兒子的角色比重遠不如今日，但到了世紀末，母親的角色變成主導。同時，小學裏開始聘用女老師，女性「陰」影沉沉地籠罩在男童頭上。大眾傳媒亦敲響「男性被女性化」的警鐘。這個焦慮在本世紀初催生了童子軍運動，它「具有減輕童軍教練及其所教練的男童之男性化焦慮的功能」。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徵兵部門發現近一半的男丁在心身方面都不適合服兵役，引起極大震盪。到了30年代，在心理學領域裏出現路易·忒爾門(Lewis Terman)與凱塞琳·邁爾思(Catherine Miles)的「性別角色認同」(sex-role identity)理論，模仿智商測量，製作出被廣泛採用的「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 簡稱MF)量表。這個量表裏出現最極端的性別偏差就是「同性戀」。該學說提出之初並無偏重男性研究，蓋其理論基礎仍然是生理學化的心理學，即把「先天」性氣質差異作簡單的羅列。後來「性別角色認同」學說發展到一面倒偏重男性研究，乃是受了心理動力學影響的結果。該角度從人生早期出發談人格成長，就多了一個與「父親」

還是與「母親」認同的命題。母親既然支配對子女的教養，而女孩與母親的角色認同又比較不會出問題，於是男孩就變成最容易產生性別混淆的「問題人物」。至戰後，甚至有學者發展出一套從FF到MM的測量：FF就是全面女性化，男孩從這個全面與媽媽認同的初級階段出發，以能達到MM的全面成熟階段為理想^②。

世紀末以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興起，用個體後天心理成長階段論取代品種的生物進化階段論，但歸根結柢仍然是將性別混淆判為「低級階段」。按弗氏學派之說：男性同性戀是男子過份與媽媽認同的結果。至於女性，其成長之阻滯，則是由於「陽具妒忌」(penis envy)而產生對自身性別之否定，也有導致同性戀的可能。與男人性別認同的女性，被稱為「陽具型女人」(phallic woman)。該詞所含義並非指解放，反而是心身不協調的神經病的意思。

但弗洛伊德本人只提出人生必須過「殺父娶母」(Oedipal)這一關的說法，在這個理論框架裏，「媽媽」是推動男孩與爸爸競爭的動力，反而是培養男性性格的很重要因素。由「戀母」發展出「仇母」理論者，乃是弗洛伊德主義之美國化。不過，弗氏晚期的理論已開始注意「殺父娶母」與「前殺父娶母」(pre-Oedipal)階段——又別名為「生殖器」(genital)與「前生殖器」(pre-genital)階段——所造成的心理問題的不同性質。一般來說，一個人「殺父娶母」的內心衝突未獲妥善解決(例如形成罪惡感)，到人生較後期會出現神經機能症(neurosis)，但這類心理問題遠遠輕於精神病(psychosis)。後者可回溯到「前殺父娶母」階段上出的問題。在這個階段

在40年代，美國連官方都攻擊「媽媽」。當時正值二次大戰期間，大量被召入伍的男丁在心身方面都不及格。當時，作戰部長的一位心理學顧問解釋：這類人的母親們沒有完成為人母的基本任務，「讓兒子在感情上與實質上斷奶」。

上，男孩是完全與媽媽認同，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是「男人」而必須和爸爸搶女人，換而言之，精神病的內容是連「殺父娶母」這一關都過不了的極幼稚階段。

弗洛伊德本人設計出的一套治療技巧：釋夢、自由聯想，都是用來解決神經機能症的，對精神病完全用不上。開始針對精神病的，乃是美國「新弗洛伊德派」的泰斗哈利·斯德克·蘇理文(Harry Stack Sullivan)。毫不意外，蘇氏用人際關係——尤其是「母子關係」——修改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發展之內在階段性。他把媽媽的不良影響、男性同性戀和精神分裂等同。

在40年代，美國連官方都攻擊「媽媽」。當時正值二次大戰期間，實行全國徵兵，但和一次大戰時一樣，大量被召入伍的男丁在心身方面都不及格。當時，作戰部長的一位心理學顧問解釋：這類人的母親們沒有完成為人母的基本任務，「讓兒子在感情上與實質上斷奶」^③。美國軍方對同性戀者的排斥持續至今，雖經克林頓總統在1993年試圖廢除限制，但積極與消極的抵制仍多方面存在。

不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軍方已充分掌握了最流行的心理學武器。除了上述「性別角色認同」學說和蘇理文的理論之外，在1943年，有心理學家勒維(David Levi)著書，指出母親「過份保護」造成孩兒日後社會適應的困難，1945年，史碧茲(Rene Spitz)以童年缺乏母愛作為人格錯亂之成因：1946年，亞力山大(Franz Alexander)視由未斷奶造成的「口腔式依賴」(oral dependency)為其病人之主要症狀^④。這個美國母親動輒得咎的

年代，剛好也是史卜克(Benjamin Spock)兒童中心教養論盛行的時代——該論發表於194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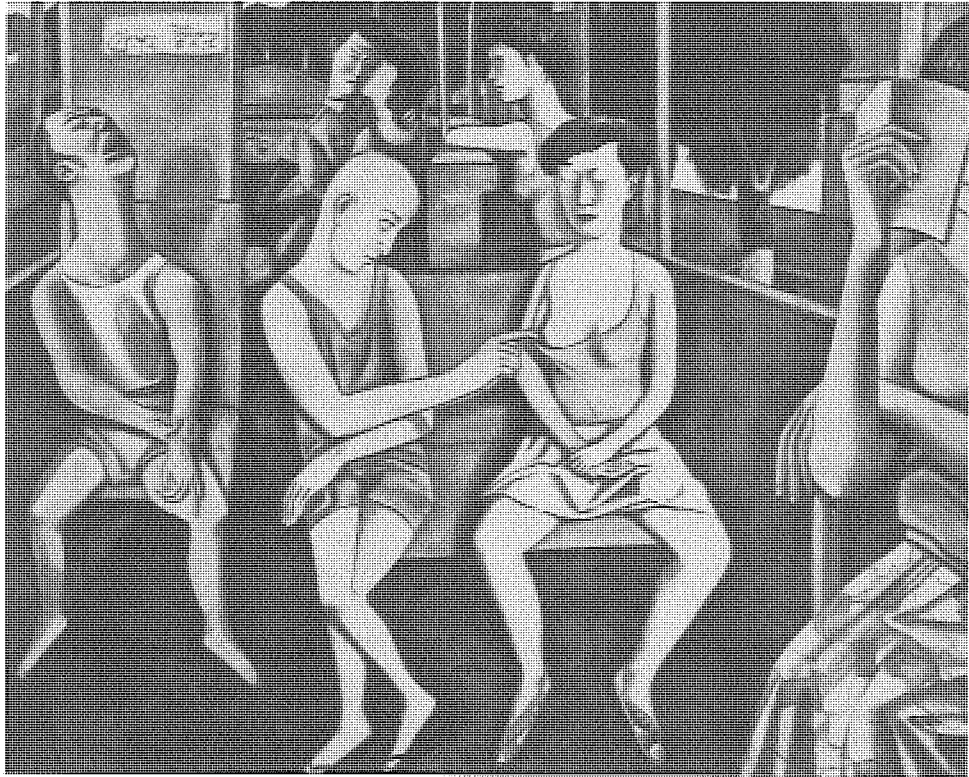
40年代末，正好是哥倫比亞大學「當代文化研究」開始的時期。

「當代文化研究」如何看中國人性格

1946年，美國海軍研究機關(Office of Naval Research)提供一筆經費給人類學家露芙·班尼狄克(Ruth Benedict)，讓她於翌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當代文化研究」(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計劃，研究各國的國民性。班尼狄克於1947年去世，計劃主任一職由瑪嘉列·米德(Margaret Mead)繼任。該計劃以當時美國文化人類學當紅的「文化與人格說」(culture-and-personality)為理論基礎。班氏和米氏都是該學說的創始人。在30年代，該學說肇始期間，受到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動力學的影響。該說把「文化」當做一個放大的「人格」，把「人格」則當做一個具體而微的「文化」，兩者都是一系列互相衝突的需求之統合形態。這個學說最基本的一環，就是用兒童教養、人格成長的方式定義文化^⑤。

「當代文化研究」計劃中一個重要單位就是「中國小組」。當時，「中國小組」的成員不能去大陸做研究，只能以紐約唐人街的移民為對象，這些人多半是來自廣東鄉下的男性，屬勞工階級，小組成員遂以來自中國城市中上階層的女留學生作補充，共計158人，大多是40歲以下，因此代表民國時代的中國人樣品。研究成果

1946年，美國海軍研究機關提供一筆經費給人類學家露芙·班尼狄克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當代文化研究」，其中一個重要單位是「中國小組」。在此計劃中，女人類學家佔很大比重，她們無疑用研究中國來借題發揮，抗議美國社會把她們看作「陽具型女人」。



中國人歷來探討國民性都是為了「救國」，美國人研究「中國人」則是借題發揮，他們研究中國人性格，歸根結柢是在談自己，但仍提供了一個對中國人本身陌生的角度。

由小組召集人露芙·本采爾 (Ruth Bunzel) 在一份報告中總結。

在本采爾的報告裏，表現了對中國人格成長最早期階段之羨慕，因為斷奶與餵食都不像美國人般有定時，排泄訓練亦不如美國人那般嚴格；中國人對糞便也不如美國人那般感到污穢；小孩子穿開襠褲露出生殖器官，亦沒有基督教由性引起的罪惡感，家中的成年人甚至可以玩弄男孩的生殖器（在今日的美國，這是很嚴重的對兒童的性侵犯）——凡此種種，都比較順乎自然、順乎本能^⑥。

中國人的人生早期無疑是放縱的，令美國人羨慕，但他們對中國人在更高階段的發展則不以為然，因為中國的兒童「沒有實現獨立與自足的訓練」，大人禁制小孩動手操作，甚至禁制整個身體的機動性，使他們這些方面的能力都不發展，被培養的只是用眼睛「觀察」的能力。中國個體之

自主能力被搞掉，正是為了使他們不要搞個人主義，服服帖帖變成家族的工具。在兒童到了可以施教的年齡，他受到的責罵，與較早時的餵食、排泄訓練一般，都是沒有規律、無預測性的。媽媽常以小孩為出氣袋，用來發泄「她對丈夫、家婆、以及整個家族情況的不滿」。美國人在這裏暗示：女人是非理性、缺乏自我控制的動物；女人當了媽媽，仍然自我中心的話，就不能顧及孩子的心理——在這裏，很明顯有史卜克的兒童中心教養論的影響。

人生早期的放縱，令中國人對媽媽加在他們身上的紀律，以及必須對家族承擔的義務感到加倍地異化，因此對人生最早期特別緬懷，常思回歸之，在他們的心理深處，特別把餵食時期的媽媽理想化。

沒有自主性的中國人個體，其婚姻也是為了家族之目的，而不是個人

浪漫的追求。在這裏，本采爾也看到了一些值得美國人羨慕的地方：在中國，男與女都該服從長輩，輩分對立取代了性別對立，男女之間不像美國那般出現兩極分化。在中國，男孩看到爸爸在祖父與祖母面前也是俯首帖耳的，縱使後者「只是一個女人」。換而言之，中國爸爸不像美國爸爸那般是「男性角色模範」。在中國，既然不像在美國一樣強調「女人必須有女人的樣子，男人必須有男人的樣子」，因此，中國婦女如果有自己的專業，在社會眼中她只是「個性很強」，不會像美國專業婦女那樣被判為「男性化的女人」(masculine woman)。「當代文化研究」計劃中，女人類學家佔很大比重——特別是領導圈子，她們無疑用研究中國來借題發揮，抗議美國社會把她們看作「陽具型女人」。

不過，借題發揮之餘，美國人仍透露中國人陰盛陽衰，不足取法。在中國的兒童成長過程中，為了預防個人進行浪漫式愛情，家中的老婦人常用狐仙女鬼的故事恐嚇男孩。因此，沉澱在男孩心理中的女性意象，唯一正面的就是他在6歲以前那些給養分、具保護性的家內女性，甚至對他施罰的媽媽亦構成「威脅性」。至於爸爸，則被形容成「不具威脅性」。爸爸在祖母面前矮了半截，不足以當兒子的「性別角色模範」，於是兒子在媽媽面前也終生矮了半截。在中國，「男性至上的文化安排受到威脅，因為男人必須服從媽媽，長期以來全面地依靠她」，結果是「他永不可能擺脫這位壓倒性的女人在他身上製造的一叢敬畏加上依賴的情結」。至於女孩，在成長過程中，感情方面的支持常來自父親與長兄，如果她是長女的話，就被分派幫助媽媽打理其他的小孩，「變

成媽媽之下的副司令」，因此，中國家庭雖然重男輕女，但女孩「看出她在男人世界中的角色並不是單純地服從，而是在形式上服從背後則潛藏有掌權的可能性」。(美國人的思考總不離「權力」！)

出乎「中國小組」研究員的意外，受訪問提供資料的中國女性比男性得不害羞，說話也比男的條理分明。這些女性「比男性更願意亦更能描述實際發生的行為」。男性資料提供者談得比較多的是「他們在性方面遇到的困難」。在留學生組中，年輕的中國女性常採取主動接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的人，為了找工作，或者為了解決移民問題，已結婚者也替丈夫去面對這些問題。(中國男人保持「清高」，「拋頭露面」的事總由女人去做！)在接受訪問時，她們常代表悶聲不響的丈夫發言。在唐人街組中浮現的形態則是：男性去找社會工作者是感到被遺棄、沒有人愛；女性則把社工當做一個「服務站」，利用它解決自己未婚先孕而又必須瞞住父母的問題，但「從無一人認為她們本身有任何私人(情緒)問題」。美國土生的華僑女性，常能「按照美國風土人情，敢於表達敵意，敢於面對他們的性問題」。美國土生的華僑男性則感到「他們不足以應付美國土生的女孩，總是想與中國出生的女孩結婚，雖然現成的一個都沒有」。至於男性移民，則索性叫媽媽替他們在鄉下找好，以便他們回去結婚。

小組成員許煊光與阿爾貝(Theodora Abel)用羅夏墨瀋圖片(Rorschach Ink-Blot Test)測驗中國人，結果符合上述留學生組與唐人街組的形態。它顯示出：在適應環境與處理內心衝突方面，中國生長與美國

中國家庭雖然重男輕女，但女孩在男人世界中的角色並不是單純地服從，而是在形式上服從，背後則潛藏有掌權的可能性。

土生的華人女性都比男性測驗對象表現出更強的「自我力量」(ego-strength)^⑦。本采爾則在中國男性的「被閹割幻想」(castration fantasies)裏，辨認出「一種普遍存在的不能勝任感」，他們總是想「回家、回到母親身邊、回中國」，連「他們的藝術與詩歌都是懷鄉病的」。她預測未來的中國將是「強烈地女性導向的」。(這裏自然又是美國女權的借題發揮！)

「當代文化研究」計劃描繪的中國人格成長過程裏，不怎麼提到中國「爸爸」，好像他並不存在似的，這與我們所慣知的傳統「嚴父」意象不符。該計劃找的中國研究對象裏，唐人街組的盡是一些移民，都是其父離鄉別井三十年，待其兒子長大後，才將他們招來美國，因此都在父親缺席情形下由母親一手養大。除了這個因素外，研究者還把當時美國「男性衰落」的憂慮，借中國研究之題發揮。這個憂慮表現在30年代開始的名漫畫連環集《勃朗黛》(Blondie)，其中把勃朗黛的先生大梧(Dagwood)描寫得很不中用，完全擺不出父親權威的樣子，遠不如他太太精明能幹。順着同一路子，60年代的電視節目《蠱惑》(Bewitched)裏，把先生大廉(Darrin)描寫得更慘：他是他太太與岳母這兩個女巫手上的玩物。

弗洛伊德化的中國國民性

作為「當代文化研究」理論基礎之「文化與人格說」，其前提之一是文化相對主義，因此，它雖受弗洛伊德學說影響，但不便公然地把弗氏性成長論當做全世界人格成長的典範，甚至還偶爾借中國來搖撼美國性別觀的絕

對性。然而「中國小組」成員中亦有屬於精神分析派的人，他們拿了該計劃從未發表的研究成果，自己到外面去發表文章，就連文化相對主義的假面也摘下，赤裸地用中國材料去印證弗洛伊德學說，把後者的有效性視作超文化的。

在這群人裏，華納·閔斯特貝格(Warner Muensterberger)發表論台山人的〈口腔性與依賴感〉一文，指出中國社會表面上是父權社會，但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具自信與安全感，在家庭裏也具比外表看來更大的影響，尤其是母親對兒子的支配。弔詭之處是：中國社會一直重男輕女。以西方標準看，中國母親對幼童的教養已是無節制地溺愛，對男孩則變本加厲，例如餵食並無時間性，只要一哭鬧，就塞食物，也一直讓他與父母同睡，直到第二胎生出來為止。這種放任也反映在「開襠褲」式的排泄習慣中。但另一方面，中國式的襠褲卻是將幼童的手腳綁住的，造成他的無助感與被動。在脫離幼小階段後，兒童之教養即由放縱轉趨嚴厲，為了灌輸他對家庭成員承擔義務。但灌輸的方法多半是強制的，於是助長他由襠褲時代形成的無助感，使被動心理進一步深化。在長大後，就出現這樣的一種人格：他一方面讓權威約束自己，另一方面在面臨成人的性任務時，有往人生早期放縱的、沉溺的「口腔階段」逆退逃避的傾向。

閔氏的那幾位(唐人街的?)男性研究對象都沉迷於賭博。他認為：這個沉溺背後的心理動力與「抽鴉片和同性戀有着緊密的聯繫」，都是朝「前生殖器階段的施虐狂與被虐狂經驗」之逆退。抽大煙者與嗜賭者一般，「享受在母親乳房面前那種嬰兒式萬

「當代文化研究」計劃描繪的中國人格成長過程裏，不怎麼提到中國「爸爸」，好像他並不存在似的，這與我們所慣知的傳統「嚴父」意象不符。這反映了研究者把當時美國「男性衰落」的憂慮，借中國研究之題發揮。

能感覺」。賭徒贏了的話，就是萬能的媽媽(命運)之眷顧。如果輸了，他就被虐狂般以砍手指的方式體現「被閹割」的願望，這樣，他可以回歸嬰兒期在媽媽面前「無助」的理想狀態。閔氏指出：即使很辛勤的中國人，也視「休息」為一個終極理想，對他來說，工作往往是一種「假的活動」，讓他可以藉此「躲開危險的捲入和避免與外界打交道」。(當時的美國華僑——尤其是唐人街不諳英語的下等階層——或會給美國人如下印象：他們以埋首討生活為藉口，從事與周圍的環境絕緣。)

雖然「中國小組」的召集人本采爾曾指出：在中國，「陽具型女人」這個概念並不適用，但閔氏還是用這個弗洛伊德概念去論證中國兩性內容的倒錯。與他那幾位不中用的男性研究對象相比，閔氏的中國女性研究對象都「顯得具有威脅性、危險性、與閹割性」；她們具有「強烈的陽具願望與陽具妒忌」。中國的民間故事多把年輕貌美的女性描寫成「閹割的、謀命的、毀滅性的」，反映出「自我功能」遭到「非自主化」(de-autonomized)的中國男性，在成人的性任務面前，出現「被閹割」的焦慮感。這種焦慮唯有朝「口腔階段」的方向逆退，才能加以抵禦。這樣，他可以從母親或母親替代物——用彼此請客吃飯聯繫的熟人圈子——處重獲童年階段的慰藉。

中國兒子用「口腔化」——亦即是「非生殖器化」——的形式戀母，也避免了西方式「殺父」衝突(這是個人人格確立必經的一關，亦即是說：中國男性的心理成長從未過關)。至於中國女性，則必須藉生育男孩子方能奠定自己的地位。男孩可以填補她的「陽具願望」，因此，她對兒子就一

方面過份地保護，另一方面則諸多期待與控制。凡此種種，皆不利中國男性人格之雄健性發展^⑧。

另一名「中國小組」的成員維珍妮亞·海耶(Virginia Heyer)，在1953年發表中國民間故事的分析，亦指出：主角多是白面書生型、性格被動的男性，但他之被動到最後總會獲得報酬，而且無須由自己動手得到。相形之下，故事中常出現主動與獨立的女性，最盛行的一個類型即為「女劍客」，其實劍可以說是陽具象徵。在這類故事中，美艷的女性對男主角來說同時也是危險的。海耶舉了一個香蕉精與毒蛇入酒罇的故事，說明在民間意識中「陽具化」的女性對男性造成威脅。由此類推，我們還可以列舉白蛇精、蜘蛛精、蠍子精、吸男人元氣的狐仙，來反映較弱的中國男性不勝應付比自己強大的對手，而出現「被閹割」之焦慮，恐懼自己會「精盡人亡」。

海耶指出：在這類故事中，「年輕的男主角，在遇到具危險性的女人時，總是完全被她屈服，……〔在故事中〕母親也總是一成不變地支配兒子」。中國人的夫婦關係往往摹擬母子關係，「顯示出婚姻狀態中的男性有向嬰兒期逆退之願望，而女性則在母親與妻子的角色間寧取前者。……唯有像母親型的妻子，才能使中國男性安心，符合他們母親形象投射之女性，則能滿足他們一切幻想」^⑨。

海耶寫作該文時，正值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時代，凡知識份子類型的人都易背上「左仔」(commies)的嫌疑，同時他們也被反共者醜化為「相公」(faggots)——這兩項罪名的共同點是「非美國式行動」(UnAmerican activities)。研究美國

中國的民間故事多把年輕貌美的女性描寫成「閹割的、謀命的、毀滅性的」，反映出「自我功能」遭到「非自主化」的中國男性，在成人的性任務面前，出現「被閹割」的焦慮感。

國民性的英國學者喬佛黎·戈勒(Geoffrey Gorer)——也是「當代文化研究」計劃的成員——曾著《美國民族：國民性的研究》(*The American People: 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一書，指出大部分美國男性都受到同儕壓力，為了證明「他們不具女人氣(sissies)，不是同性戀」，一般不敢碰「女性化」的文學與藝術，甚至連「所有智力方面的興趣也多少染上這方面的色彩」^⑩。美國人的英雄從來都不是知識份子，而是運動員，在校園裏，甚至女同學都這樣想。即使今日社會風氣已經比較多元化，情形也不見得有多大變化，一般來說，藝術圈子仍然是同性戀者的集中地，因此在這些圈子裏愛滋病也就特別流行。

除了閔斯特貝格和海耶之外，「中國小組」的另一組員約翰·維克蘭(John H. Weakland)也是精神分析派的，他認為：在中國文化裏，即使男性在進行異性關係，亦往往用「口腔辭彙」去設想性行為。他說中國人的母子關係或可解釋這種「口腔化想法」之起源。這種想法是將「性」當作是一種「採補」、一種滋養，而且總是將女性所能提供的養分視作無窮，把男性的精液當作有限，因此主張男方含精不射，而去吸取女方的。「精」與「氣」這一類辭彙都有一個「米」字根，也與吃食有關。這種「口腔化想法」無疑是因心理錯位而弱化的男性之投射，他們把女方作不切實際的強大化。

但維氏不同意閔斯特貝格之中國男性面臨成人世界時朝「口腔期」逆退的說法。他認為中國人的「口腔期」亦不是頂安適的，他們對這個失掉了的樂園之懷舊，乃想像成分多於事實，事實上，口腔滿足常因經濟匱乏而遭

剝奪。中國男性在性事中有己方「被吸乾」的恐懼，或許反映出幼小時被餵食所造成的被動性格，因為控制權在母親那一方，「中國母親對幼兒主動的要求感到頭痛，但如果幼兒限制一己活動與自主性的話，〔母親〕就會去滿足他被動的、承受式的口腔需求」。因此，歸根結柢，又牽涉到權力關係。中國母親從一己利益(便於控制)出發，在孩童身上養成對環境的「依賴式適應法」，又為口腔期以後來自父母之其他禁制所加強^⑪。

弗洛伊德派的泛性論，雖然與「當代文化研究」有一定距離，但該計劃亦深受其影響，這可從領導人不打算發表隨便談話的記錄中看到。同一批人繼「當代文化研究」後，在紐約市自然史博物館舉行「中國人政治性格」(*Chinese Political Character*)研究計劃，留下座談記錄。在1951年1月的一次座談中，出席者有米德、維克蘭、本采爾、梅卓洛絲(Rhoda Metraux)、萊特思(Nathan Leites)、沃爾芬斯坦(Martha Wolfenstein)。下面是會議記錄中間的一段^⑫：

維：中國傳統的美艷婦人的形象是十分脆弱的。

米：也是令人驚恐的。

維：如果你伸手去要她，是十分危險的事。

本：她愈美艷、纖細、就愈危險。

米：這或能說明點甚麼。

萊：這是如何一個危險法？會發生甚麼？

梅：無人知曉。

沃：(中國人)是怎樣把這個危險形容給小孩子知道的？

萊：美艷婦人如何具有毀滅性質？

維：她奪走〔男人的〕精力。

本：〔她〕耗竭男子的生殖能力與生命元氣。

維：在這一點上，我們還發現其他方面。在一齣皮影戲中，一個美艷婦人原來是一條白蛇。

沃與萊〔同聲〕：白娘娘 (Mrs. White)！

萊：懷理(Wylie)的一個故事。

這一段話，與其說在談中國人心理，毋寧更像精神分析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s)治療術，讓在座各人透露心頭的陰影。座談可預料地扯到把「媽道主義」說成是美國流行病的懷理。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米德在30年代發表南太平洋島嶼社會的研究，指出「性別角色認同」因文化而異，批判美國性別定義之文化局限性，但上引未發表材料裏透露：米德思想的深層處仍然是不折不扣美國式的。

在座6人中有4位是女性，而且都有自己一番事業，乃衝破當時社會性別藩籬的女性專業者中佼佼者，但她們看問題的角度，絲毫沒有背離男性化的崇尚陽剛。這批美國女性的立場，可說是60年代女權運動的先聲——女性既然要爭「權」，自然亦盡力抗拒使個體弱化，把個人獨立能力「閹掉」的媽媽化影響。換而言之，她們自身不免落入了「陽具型女人」之窠臼。

上述這類中國人陰盛陽衰論，與後來心理醫學的一些研究呼應，例如研究「縮陽」(koro)或「怕冷」(frigophobia)這類中國男人才有的文化症(culture-bound psychosis)。「縮陽」精神病的患者都是男性，他們有自己的陽具不斷縮小的幻覺，並相信當陽具縮進身體裏，整個不見掉的時候，

人就會死亡，因此是一種閹割恐懼症。「怕冷」的病例也集中於男性，乃是恐懼自己身子虧弱，達到執着與強制性地步——例如，大熱天亦穿層層衣服。兩者的共同點是男性對陽氣耗損與生命元氣喪失之焦慮，都與「中國人對性的基本觀念深切有關」。專家的看法是：「縮陽」源於童年時母愛不足，「怕冷」則由媽媽過份保護造成^⑬。

中國式人格無法正當處理 攻擊性

用弗洛伊德典範看中國人格，既然得出中國人過份與「媽媽」的性別認同，男兒性不彰，自然也涵示中國男性成長過程沒有過「殺父」這一關。「當代文化研究」計劃已指出：中國式父親也是在祖母面前俯首帖耳的，縱使後者「只是一個女人」，既然如此，父親根本就不足勝任兒子的性別角色模範，也不是兒子在成長過程中必須造反的對象。中國人性別分化根本不徹底。

「當代文化研究」計劃「中國小組」成員、華人人類學家許煥光，對西方式的父、母、子鐵三角論提出異議。他在1953年發表《美國人與中國人》(Americans and Chinese)一書，指出中國式家庭成員眾多，孩兒不一定只親爸爸媽媽，還有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伯姨媽舅舅，因此「殺父娶母」的理論不見得適用於中國人，而且，美國人過份強調「性」，看任何問題都採此角度，中國人無此執着。

但中國家庭歸根結柢是發揮父系祖先崇拜功能的單位，縱使許煥光認為在中國家庭裏親情是擴散的，而不

華人人類學家許煥光，對西方式的父、母、子鐵三角論提出異議。指出西方「殺父娶母」的理論不見得適用於中國人，並認為美國人過份強調「性」，看任何問題都採此角度，而中國人則無此執着。

像美國那樣乃三人之間競爭、看誰獨佔的獎品，他仍得承認中國家族制度有一個主軸。在1948年發表的《在祖先的陰影下》(*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裏，許氏說：中國親屬制度的主軸是非性化的「父子關係」，美國的則是以性為主導的「夫婦關係」。這裏引起一個問題：夫婦關係是同代人之間的，父子關係則是上下代的，前者至少在理論上是平等的，後者則肯定是不平等的。那末，中國人的人格內容裏權威主義因素是否偏高？許氏指出父子關係乃權威性的，但沒有大量著墨。

1950年，法蘭克福學派的《權威主義的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書發表，掀起該論題的高潮。在60年代之美國，就導致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及其弟子所羅門(Richard Solomon)對中國人權威主義人格的研究。此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及美國校園造反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反權威是時代精神，談權威問題很合時。但白魯恂與所羅門師徒二人途徑迥異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心理調查，他們的偏向仍然是投美國人所好的弗洛伊德化的心理動力學。而且，他們都曾參考過「當代文化研究」的成果中已發表的部分。

白魯恂的《中國政治精神：政治發展中的權威危機之心理文化研究》(*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發表於1968年。他認為中國異於其他由反帝而獨立的前殖民地，後者都經過一翻尋找自我認同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唯獨中國人面臨現代世界所經歷的轉變是「權威危機」(authority crisis)。

白氏與「當代文化研究」，同是用兒童成長方式定義文化內涵。他認為在中國家庭裏，個人無法養成由自己節制攻擊性，必須有賴外在權威——爸爸——來控制它，現代化過程導致外在權威弱化，在中國人心理上造成莫大的焦慮。中國人因權威弱化而釋放的攻擊性，正是這種焦慮的表現，但他們這種攻擊性並沒有導致「自我」確立。中國人「造反」——最典型的是文革——並不是反權威，而是責怪當權派「權威性」不夠，造反的目的乃為了樹立更純正、更絕對的權威。

中國家庭要求個人遵守孝道，屈服於父親權威底下，因此個人伸張性無從建立，反而，它以「俯首聽命於權威性父親的諸般殘忍」來建立自尊，養成一種「道德上的被虐狂」(moral masochism)，亦即是只有在自己成為「受害者」的時候，方能滿足一己的自戀、自大與優越感。換而言之，面臨與他人利益衝突的場合，中國式個體往往無法發揮一己攻擊性，因為它不懂得自我調節，任何對抗場景都會引起焦慮，到了發作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失控的撕破臉地步。於是，他只好忍讓，亦即是不保衛自己，反而期待對方不發動攻擊，但如果對方不就範，中國式個體既然已把攻擊性導向內，心裏就會出現憤恨，把發揮正常攻擊性、控制了情況的對方說成是加害者，比自己在道德上低一等。

所羅門的《毛式革命與中國的政治文化》(*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於1971年問世。他師承白魯恂，用父子關係解釋中國式權威主義人格的形成，並認為這個「支配與服從」模式影響其他關係。在中國，兄弟關係也擬於父子關

1950年，法蘭克福學派的《權威主義的人格》一書發表，導致政治學家白魯恂及其弟子所羅門對中國人權威主義人格的研究。白氏認為中國人「造反」——最典型的是文革——並不是反權威，而是為了樹立更純正、更絕對的權威。

係，因此也是不平等的，至於友情則是一個理想，因為中國式個體傾向壓抑私人思想感情，平等關係遂不發達，甚至平等關係的進行也多透過「中間人」，不是由自己去面對。中國人的成長過程從無像西方人那般過了「殺父」這一關，中國人在與爸爸發生衝突的場合，總是躲到了媽媽背後，叫媽媽去當「中間人」，因此自我就永遠沒有確立。

所羅門亦繼承了「當代文化研究」的方法，用兒童成長方式定義文化，並像閔斯特貝格與維克蘭等人一般，認為中國人格成長被阻滯在口腔期。不過，閔、維等氏強調的是「性」，因此滯留在口腔階段的含義就是「被閹割」。所羅門注意的則是攻擊能力之受損，因此中國人的口腔化到了他手裏，就變成權威主義人格的心理基礎。所羅門說：中國式權威表象是「口」，有權威的人才能說話，無權的人只有「聽話」的份，他們不能吐，只能吞，因此無權就得「吃苦」與「吃虧」。中國式個體既然沒有確立，其攻擊性必須由外在權威控制，這個權威一旦崩潰，不懂得自我調節的中國人就會出現「天下大亂」局面，因此攻擊性在中國人心理上總會引起焦慮。

中國的現代革命只是把人格從「口腔階段」進展到「肛門階段」而已。毛澤東叫先前「吃苦」、「吃虧」的老百姓「吐苦水」，他在演說與文章中也喜用「放屁」意象，而「解放」也有排泄的意思。這種攻擊性的釋放，自然導致「天下大亂」，但毛式革命已經克服了口腔式人格對發揮攻擊性所造成的焦慮，反而能操縱這個「天下大亂」為己之用。中國人攻擊性是發泄出來了，但仍與個人之確立無關，因為不論是亂式還是被操縱的，都不是經由

個體自己調節的。因此，中國人的現代革命雖然把人格從「口腔階段」升等為「肛門階段」，但其人格仍然是「前生殖器階段」的。換而言之，沒有經由自己面對攻擊性，與沒有經由自己面對性問題一般，都是個人生命力「被閹割」狀態。

必須承認：性與攻擊性有一定的聯繫，它們動用的心理資源是同一個：能不退縮、能由自我面對，以及能克服障礙。但在今日美國，「性」與「暴力」關係之密切，世上無出其右。美國男性的雄健理想是敢於克服，他們除了去獲得女性之外，還必須克服自己身上的女性化因素和心理上的女性陰影，不論是心理的外射還是內射，克服的對象是同一個：女性。在「個人如城堡」的美國文化裏，美國女性個體化之完整、個人確立之全面性，在當今之世亦無出其右者。她們在保衛自我疆界時必須發動暴力（真實的或象徵的），亦無異於男性。換而言之，美國女性乃最難「克服」者。在這場美式足球裏，「性」終不可避免與「暴力」混為一談。

所羅門說：中國式權威表象是「口」，有權威的人才能說話，無權的人只有「聽話」的份，他們不能吐，只能吞，因此無權就得「吃苦」與「吃虧」。中國式個體既然沒有確立，其攻擊性必須由外在權威控制，這個權威一旦崩潰，不懂得自我調節的中國人就會出現「天下大亂」局面。

註釋

① Bram Dijkstra: *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8–59, 219–20.

② Joseph H. Pleck: "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 Its Rise and Fall, 1936 to the Present", in Harry Brod 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22–33.

③ Mary Beth Norton: *A People and A Nation*, vol. 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2), p. 877.

④ Reuben Fine: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9), pp. 152–59.

⑤ Philip K. Bock: *Rethink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Study of Human Action* (New York: W.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8), pp. 41–43; William C. Mansion: *The Psychodynamics of Culture: Abram Kardiner and Neo-Freud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pp. 42–44. 蘇理文與該學說亦有密切關係，他於1937年成立《心理醫學》(Psychiatry)雜誌，多年來作為「文化與人格說」的主要論壇。

⑥ 下列有關引文不另加註，皆出自 Ruth Bunze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0)。此乃打字本，只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閱覽室內發現一本。

⑦ T.M. Abel and F.L.K. Hsu: “Responses of China-born and American-born Chinese to the Rorschach Test” (1949)，美國國會圖書館特別文件收藏室瑪嘉列·米德檔案〈當代文化研究部分〉，G-29, Ch-Doc, v. 29, Ch. 679.

⑧ Warner Muensterberger: “Orality and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rn Chinese”,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Inc., 1951), pp. 37–68. 在西方的意象符號學中，過份地強調「吃食」與「休息」似乎乃「被去勢」之表象。1988年的北歐電影《征服者裴里》(Pelle the Conqueror)，描寫一個丹麥地主到處拈花惹草，終於被夫人乘他熟睡時把他閹割，過了一段期間，他再現身銀幕時，是在大白天也蓋着一張毯子躺在沙發上，不斷地吃零食，其夫人則坐在身旁「母性地」照顧他。

⑨ Virginia Heyer: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Chinese Stories”, in 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etraux eds.: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21–34.

⑩ Geoffrey Gorer: *The American People: 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4), p. 129.

⑪ John H. Weakland: “Orality in Chinese Conceptions of Male Genital Sexuality”, *Psychiatry*, vol. 19, no. 3 (August 1956), pp. 237–47.

⑫ 美國國會圖書館米德檔案〈當代文化研究——中國人政治性格〉部分，G-63，〈中國人政治性格會議記錄〉內1951年1月16日部分，頁5–6。

⑬ Rin Hsien: “Koro: A Consideration on Chinese Concepts of Illness and Case Illustrations”, *Transcultural Psychiatric Research*, no. 15 (1963), pp. 23–30; Rin Hsien: “Two Forms of Vital Deficiency Syndrome Among Chinese Male Mental Patients”, *Transcultural Psychiatric Research*, vol. 3 (1966), pp. 19–21; Chang Y.H., Rin H., Chen C.C.: “Frigophobia: A Report of Five Cases”, *Bulletin, Chinese Society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vol. 1, no. 2 (1975), pp. 9–13. 這些所謂文化特有症，病例其實只有幾宗，而且集中在華南與東南亞，因此不如說是亞洲亞熱帶的文化症來得妥當。

孫隆基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史丹福大學之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坎薩斯大學、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拔塔大學，現任教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學。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備受學術界及社會注意。